

我对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的一些看法

周清海

摘要

我是在三个大前提下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前提是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关系过去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第二个前提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发展，带动了汉语的大融合；第三个前提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快速的发展，使更多人愿意学习汉语。在这三个前提下，讨论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应该如何调整。

关键词：古今汉语 大华语 语言融合 华语教学

我认为，古今汉语是一脉相承的。现代汉语是“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语言。“古今杂糅”的现象，书面语比口语多些，而且不断在增加。现代汉语引用古汉语的现象，如“为官避事平生耻”，引用自元好问的诗句：“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不畏浮云遮望眼”，引自王安石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处。”以古汉语的词作为语素而造的现代汉语新词，也很多。写现代汉语而不知不觉用了古汉语的词法和句法的更是数不胜数。《现代汉语词典》注上〈书〉的词，大部分是古汉语。

“南北混合”的现象，口语比书面语多些。许多过去口语不说的，如“整不整齐”、“讨不讨论”，量词的混用等等，都出现在现代汉语里。华语区的华语，“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现象更甚于现代汉语。

所以，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方面，不能把古今汉语当作完全没有关系的语言。现代汉语和华语里的“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关系，应该处理好。

从汉语的分裂与融合观察。1949年之前，中华民族经过了长时期的苦难年代——军阀混战、北伐等战乱，跟着的是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在这个苦难的年代里，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大迁移了。他们给华语区带去了“国语”和“国文”，并在所居地发展而形成了当地的“华语”、“华文”。

1949以后，从冷战时期开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很少和海外华语区交流的中国现代汉语，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之后，出现了自己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华语区的“华语”、“华文”，差距是相当明显的。

秦朝统一了文字，而书面语，在秦之前，大体一致。口语的分歧却始终没解决。直到中国成功地推广普通话，才在分歧的口语（方言）基础上，出现了普通话通行全国的现象。这是中国三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语言难题。1949年之后，解决了。这是了不起的语言规划成就。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华语区之间的交往频繁，在语言方面出现了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怎样使这个大融合顺利进行，是应该注

意，细心思考的。

从这个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观察，并结合“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特点，我对“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说些个人的看法。重点在三方面：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二、大华语与语言融合；三、华语区与华语文教学。

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值得讨论的问题太多了。这里我只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古代汉语的词义和语法保留在现代汉语的情况。二、古代汉语研究和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

1.1 古汉语的词义和语法保留在现代汉语的情况

我们结合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1)“劝其伐燕，有诸？”《孟子·公孙丑下 4.8》杨伯峻（2005，页 100）语译为：“齐国讨伐燕国，你曾经劝说过，有这回事吗？”用“劝说”来语译“劝”，还是应该语译为“你鼓励齐国讨伐燕国”？究竟“劝”是“劝说”还是“鼓励”？

《说文解字》：“劝，勉也”，现代汉语的“劝酒”就是“鼓励”的意思。“劝架”，的“劝”是“劝阻”，这个意思是后起的。王力（2000，页 83）将“劝阻、规劝”和“劝说”都归为“后起义”，是对的。显然杨伯峻的语译是不妥当的。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1 拿道理说服人，使人听从。2 <书> 勉励。”“勉励”义的“劝”不限于书面语，“劝酒”、“劝杯”在现代汉语口语里就用得非常多。

(2)“季氏旅於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论语·八佾 6》，《说文解字》：“救，止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救”说：“2 援助人、物使免于（灾难、危险）：救亡|救荒|救灾|救急。”《现代汉语词典》试图把“终止”和“救护”两个意思整合为一个，致使释义除了有语病之外（援助……物），也不能概括“救”字下所有词条

的词义。

其实，救，就是终止（灾难），“救火、救灾”等词的“救”就是“终止”；和“救命、救国”的“救”（拯救）不同。“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诗经·谷风》，可见“救”自古就有两个意思。

(3) 舸，“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注：“舸：大船，这里泛指船只。”《国语辞典》：大船。《现代汉语词典》：<书>大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文>大船，百舸争流。

《说文解字》没有“舸”字，新附有之，注云：“舟也。”《王力古汉语字典》：船。方言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古代汉语词典》：船。

我们看看古汉语的用例：“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三国志》“上建旌旗，豫备走舸”“备乃乘单舸往见瑜”《资治通鉴》，王海棻（2012，页328）：“走舸：轻快的船”，“单舸：单独一只船。”。从这些资料看来，“舸”不是“大船”，而是“船”的通称。

(4) “我真担心骨折……不光是‘宅’在家里，而且连上下楼梯都有困难。”（叶永烈）“宅”是名词，作谓语，带了补语“在家里”，作者觉得这和现代汉语“宅”的用法不同，所以加上引号。《现代汉语词典》就认为“2（动）待在家里不出门：你也出去走走，别总是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是现代汉语名词作谓语，下带宾语或补语的现象，如“将他一下”，“家天下”，都是古汉语名词用为动词：“不蚕而衣”、“先主器之”、成语“不胫而走”等用法的继承。

(5) “忙工作”是“为工作而忙”；“小他一岁”是“比他小一岁”，都是形容词带宾语。古汉语形容词带宾语是非常普遍的，如“登泰山而小天下”，“君子之远其子也”“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贤之”。现代汉语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越来越多，如“繁荣经济”、“疏远我”等等，就是“清洁”“进步”“整齐”等形容词将来也可能带上宾语。“这句话，温暖了整个冬天，美丽了整个中国。”就是很好的表达。

现代汉语名词和形容词带上宾语，要不要当作“动词”，而另归一类？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比名词多些，要不要把形容词和动词一起归为“谓词”？汉语的词类在句子里的作用，和英文的词类不相同。

从古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名词和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可以当作汉语名词和形容词的特点之一，而不必另外归为“动词”，可能是更好的作法。在对外汉语教学里，怎样处理才适当，是应该讨论的。

(6)“延长、延迟”的“延”显然和“延聘、延师”不一样。“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使楚》，“余人各复延至其家”《桃花源记》。“延”的意思就存在现代汉语的“延聘、延医、延至”等词里。《现代汉语词典》用〈书〉标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延”分为1引长，2引进、邀请3推迟，义项的分类显然不如《现代汉语词典》，但没有特别标注〈书〉，就比《现代汉语词典》好。

“延”的“延长”义，也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君亦悔祸之延”。“延”的两个意思都是继承古代汉语的。

(7)“乎”、“于”都是古代汉语的介词，是相通的。“明乎此”就是“明于此”。下面的句子连用了“乎于”：

“向科学进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明乎于此，就不会对人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挫折大惊小怪了。”¹

把“发乎情，止乎礼”，“发于情，止于礼”，说成“发乎于情，止乎于礼”，也是连用了“乎于”。

“亲戚好友”、“亲朋好友”和“亲朋戚友”都可以用吗？“戚”是“亲属”，也是“忧戚”：“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3.4》，简化字“戚”也用来表示“憾”。“戚友”的“戚”是“亲戚”还是“忧戚”？意义就含糊了。所以，“亲朋戚友”就不是很好的用法。

“制”有“控制”和“制作”两个意思。说“制止侵略、制止暴乱”，意思是清楚的，但说成“止暴制乱”，“制乱”是“控制暴乱”还是“制造暴乱”？就不十分清楚了。

“乎于”、“亲朋戚友”、“止暴制乱”，会不会在现代汉语里定居

1 参见《咬文嚼字》（2001）第8期，页25。

下来，还有待观察。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研究现代汉语的词义、语法以及教学，都需要了解古汉语。编好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学习型词典更必须建立在了解古今汉语的基础之上。

1.2 古代汉语的教学必须建立在对古代汉语的认识上

现在的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古代汉语的语译，问题更多。杨伯峻先生（2008）说：“要写《论语译注》，必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时的本义。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作者的本意和本义，未免把译注看得太容易了。……若要得作者的用心，一定先求当时语句的流行意义，因此我在着手译注《论语》之前，先写了《论语词典》，这样，不致被纷歧的解释所迷惑。……”杨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对杨先生的三本著作：《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和《春秋左传注》是非常肯定的。但要做到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可不容易，就是他本人也没有完全做到。我们举些例子来讨论。

(1)“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治长 5.26》杨伯峻（1985，页 53）认为“施，犹著也”，即表白的意思。这个意思在杨伯峻的《论语词典》里只出现这一次。叶嘉莹（2013，页 18）认为“不施劳——不把那些劳苦的事情推给别人去做。”《论语·颜渊 12.2》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施”，就是“给与”的意思，这个意思在杨伯峻的《论语词典》里共出现了 3 次。

安作璋（2004）主编的《论语辞典》将“施劳”单独立词条，以“夸耀自己的功劳”为主要意思，而以“加给别人”为另一说。

我认为对“施”的解释，叶嘉莹是正确的，“勿施于人”就是最好的内证。

(2)“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叶嘉莹认为“‘不

吾知’就是‘不知吾’，颠倒为‘不吾知’是表示强调……。”²其实，“不吾知”并没有颠倒，而是古汉语正常的句法。古汉语否定句的宾语如果是代词，代词宾语就必须在动词之前，如《诗经》的“不我遐弃”、“岁不我与”，《论语》的“我未之见也”，《孟子》的“臣未之闻也”等等都是。汉以后，否定句代词宾语后置才占优势。叶嘉莹的说明是以今释古。

(3)“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6.9》如果语译为：“杨氏主张为自己，是不要君王；墨氏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的人，就是禽兽。”就是将古代汉语的“是”和现代汉语的“是”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

杨伯峻的《孟子译注》用“这便”，“那就”，也用“就是”，语译“是”，摇摆在代词和判断词之间。

“是”用为判断词，大概出现在战国后期，这里的“是”是指示代词。

(4)“遂寘羌氏于城颖。”《左传·隐公元年》，研究者一般都说“寘，音义同置。”（杨伯峻，1995）；或者说“‘寘’同置，此处有放逐幽禁之意”（张世禄，2000）；或者直接用“置”（杨金鼎，1993），但不加说明；也有不提“置”，直接用“寘”，说：“寘”，放置，安顿，这里有放逐的意思。（王力，1962）这是古代汉语里的古今字问题。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凡读经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王力（2000）说：“寘”“置”不同字。“寘”指具体的行为；“置”则兼有抽象的意义。设置的“置”不作“寘”。《左传》“寘”“置”区别甚严。《王力古汉语字典》就很重视古今字的问题，中文系的古代汉语选文就应该走《王力古汉语字典》的路。

上面这些例子都涉及古代汉语研究和现代汉语教学的结合问题。华语教学，无论是母语或者外语教学，都可能涉及古代汉语，因为现

2 《咬文嚼字》2001年第8期，页48。

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处理好上面的问题，对做好古代汉语的教学是非常关键的。古代汉语应该如何语译为现代汉语，更应该加以重视。

古代汉语教学，主要是词汇问题。王力认为：“语法……古今相差不大，容易解决。问题在词汇，这必须化很大的力气。……古代汉语的问题，主要是词汇的问题。所以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词汇上。”（王力，1982，第三册页402-405）但是，古代汉语的词汇分布请看下面的研究结论：

“高频词占词汇数量的比例有限，为提升教学效率，确定教学内容时可以有选择地先教学高频词，而推迟甚至忽略教学低频词。……如必须掌握前3795个高频词，才可以达到80%覆盖；而如果希望达到90%的覆盖则必须学习12425个高频词。”（朱庆之、王婵娟等，2019）

要掌握3795个高频词，对中文系的学生，是可能达到的目标吗？王力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只收了一千两百多个。“如果希望达到90%的覆盖则必须学习12425个高频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高频词占词汇数量的比例有限”，就意味着每一篇文言选文都会遇到大量的非常用词。让学生去面对这些困难，有必要吗？为了减轻学习古代汉语的词汇负担，我主张只选有意义的段落。（周清海，2018）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古汉语词汇的负担。

我们也应该考虑为华语区建立文言语料库，特别是语文教学里的文言选文的语料库，这对于教好文言文，作用和意义都非常大。（周清海，2015）如果根据文言选文语料库的资料，编辑古代汉语学习词典，对教好文言文，帮助将更大。

大学中文系的课程，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研究与教学，也不应该太早分流。

二、“大华语”与语言融合

华语区最早的华人移民，大部分是没受教育，或者教育程度偏

低的农民。军阀时代、抗日战争到1949年前后，才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移民到华语区。他们通过办学、办报，把他们在中国所受的语文教育——注重标准书面语，带到了华语区，建立了各华语区的书面语。这就是华语区的书面语高度一致的原因。

1949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和华语区很少交流，华语区的书面语和口语，和现代汉语的差距相当明显。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处在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现代汉语和华语在频繁的交往中相互吸收与融合。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与融合最为明显。目前，现代汉语从华语区输入词汇的局面正在逐渐转为向华语区输出。许多现代汉语的词汇，都出现在华语区的语言应用里。

在这个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交流中达意的准确性，让华语在交流中自然融合。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各华语区的语情，才能让这个融合的过程更加顺利，才有可能协调和解决华语区里的语言变体问题。这就是我们编纂《全球华语词典》（李宇明主编，2010）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李宇明主编，2016），以及研究“全球华语语法”³，以期最后编成“全球华语语法长编”的原因。

我们希望打破华语区之间的语言藩篱，建立沟通，了解彼此的差异，以减少差异，更好地为华语和现代汉语的和谐融合建立基础。在讨论编辑《全球华语词典》时，北京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先生建议词典给词下定义，应该用现代汉语。这个提议得到参与编写的学者们的积极支持。所以，《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就是有意地向现代汉语倾斜，引导华语的相互融合。（周清海，2007）

我（2012）对《全球华语大词典》说过下面的话：“《全球华语大词典》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从全球华人的立场，为全球华人服务的词典。这是对不同地区华人智慧的肯定，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语言和谐的重视。《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纂，只是全球华人合作的一个开端，也是人和的具体表现。”

从华语走向世界这个视角观察，华语的应用与规范问题，就不

3 邢福义教授主持，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可能只从中国国内的需要或者角度考虑。我在2003年说：“我主张华语必须有共同的核心，各地区的华语共同向这个核心靠拢，但也需要容忍语言的地域变体。只有在大同之下，包容小差异，才有助于华语走向世界。”就是本着这种协调的态度，我们才逐渐有了“大华语”的概念。2005年之前，参与编撰《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以及研究“全球华语语法”的朋友们，都了解华语差异的存在，但正式把不同华语区的语言，用“大华语”来概括，是陆俭明先生（2005）。

通过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我们认识到，全世界有一个比普通话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大华语”。李宇明先生（2017）给“大华语”的定义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他说：“这是在多年探讨、多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一个共识性表达。”

从“大华语”的发展趋势看来，华语的逐渐融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高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扩展，普通话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这将使各地华语相互靠拢，使华语原来具有的共同核心更加坚实。但是，这个影响应该是在交流中逐渐发生的，而不是强行统一的。如果要这种趋同更显著，华语区之间就必须有更大的共识，必须积极进行引导的工作。

“大华语”的概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这将直接影响语言教学与语言研究。陆俭明先生（2017）提议：“大华语”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可以有一定宽容度。但是，如何具体理解“弹性”，具体该如何掌握“宽容度”之度，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具体该如何操作，怎么落实，目前尚无研究。……上述问题无疑应作为首要课题列入“全球华语研究”之中。我（2017）提议的“教学从严，评鉴从宽”的概念，也值得大家关注。在“大华语”的观念下，语文研究和语文教学人员应该研究和了解各华语区的语言变体，也必须以更宽容的态度来看待现代汉语的规范问题。

三、华语区与华语文教学

在“大华语”的概念下，我们的华语教学必须做相应的改变。我在《大华语的研究与发展趋势》、《大华语与语言研究》、《大华语与华文教学》等一系列论文里，提出了一些看法。这里再补充一些意见。

(1) 华语文课程与教材，必须从整个华语区的需要着眼，让学习者了解其他华语区的社会与语言，方便他们以后与其他华语区交往。

无论是中国的语文教材，或者其他华语区的教材，都应该考虑容纳华语区的华文作品。这样做，对华语区的写作人，也是极大的鼓励。将文化上的认同，体现在华语文的教学。通过语言的学习，重建年轻华人的人际联系。

(2) 我们也必须考虑充分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性，提供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参与，因为推广华语是所有华语区的责任。

我们更应该积极培养华语区的华人以及非华人的华语教师，华语语言研究者。非华人华语教师的增加是汉语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汉语的国际推广，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以往都没有充分考虑华语区的作用。无论是“请进来”或者是“走出去”，都单独从中国或者中国台湾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作用，组织、带领或制造条件，让各华语区参与华语的推广，这样做对华语的全球化是非常有利的。

(3) 善用语言，语言就是一种资源。在全球化的环境下，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华文作为语言资源的作用将更加显著。方言与华语应该有上下位的区别。在说明新加坡的语言问题时，我(2018)说“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并没有自己主要的方言。考虑到每个人的语言能力有限，我们选择了保留华语跟英语，在很早的时候就让方言退出教育的舞台。”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地方方言，如台语、粤语，对华语区的之间的交往，不一定有利。所以，方言与华语的上下位关系，应该受到重视。

大多数华语区是多语的，对于大华语区的华人来说，单靠华文是不足够的，更要求华人具有多语的能力。所以，华语区的语言学

习不能只限于华语文的学习，不能让华语文的学习妨碍当地语言的学习，和国际语言的学习。只有掌握多种语文，才是华语区华人今后的出路。华语区的华人，如果放弃多语，只强调华语华文，无疑是自我孤立，自己放弃与他人竞争的条件。所以，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不能把华语文教育只看作是民族的语文教育，只是为保留民族的特点、文化的特点服务。只强调语言的民族性，文化性，是比较狭隘的。

有些华语区更以母语的水准在当地办学，以致使得年轻的下一代没建立多语的基础，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些年轻的下一代只能反移民回到母国。这种反移民的现象，如果越来越严重，恐怕不是健康的。

虽然华语文的经济价值越来越显著，但是华语文要成为国际语文，不能只靠经济因素。华语文成为国际语文也不是十几或二十几年内的事，经济价值，只是让这个语文更容易推广，更多人愿意学习。我们不能企望只靠华语文，就能配合全球化的需要。

(4) 从事华文教学与研究必须有国际视野，不应再各自为政，要往优势互补，人才与资源共享的方向努力。

语言教学当在地化，将更广泛地带动华语文的学习，提供机会让更多人参与。我们更应该考虑借用与调动华语区的语文人才。推动华语文教育，不一定完全靠中国。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前主任陈之权先生给我的电邮也说：“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从事华文教学与研究必须有国际视野，不应再各自为政，受限于一国一地，要往优势互补，人才与资源共享的方向努力。”关于华语教育资源共享，加拿大孔子学院任中方院长向平给我的意见是：“应该有机机构出来牵头，拿出具体的方案来。如果没有人或机构当‘吸铁石’，就很难吸引世界各地各种优质教学研究资源，就很难形成合力，从根本上改变单兵作战、重复消耗，事倍功半、欲速不达的格局。”

已故台湾董鹏程先生提议的华语文教学大联盟，就具有方向标的作用。这个联盟应该怎样组织起来，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应设立一个机构，在“大华语”概念的引导下，有计划地收集与出版华语区的优秀教材，分级读物，并为华语区编写词典。汉语教材都在中国或者中国台湾编写，在海外不一定适用。应该在当地领导组织编写小组，为当地提供合适的教材。当然，我们也应该考虑华语区之间的合作以及语文教育和出版的企业化问题。

中国大学延聘国际人才，对大学的发展是有利的，唯独在华语人才方面，受了“汉语故乡”观念的影响，和华语区的交流不够，也很少让华语区的教学人员参与汉语的推广与研究，更少延聘这方面的研究人才。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课题。重视华语区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人才，将鼓励更多人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华语文的学习与研究，应该是跨区域的。各华语区的语言教学机构与研究机构应加强联系，有计划地让语言学习者，语言教学者与研究者，有机会在华语区里交流。新加坡、香港都有条件发展成为东南亚甚至是世界的华文教学与研究。向这个方向发展，才能找到新港华文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出路。

(5) 对语言研究的期望：“要避免汉语语言学和汉语教学交流困难的问题，就要求语法研究尽量用非技术性的术语来呈现，并且注重突出汉语的语法特点，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周清海，2018）“目前大部分的语法著作都是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这些语法著作都没有把书面语语法的不稳定性适当地反映出来，更少讨论口语和书面语的差距，以及华语与现代汉语的语法差距。这给汉语的传播带来困难。”（周清海，2014）

参考文献

- 安作璋主编(2004)《论语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宇明主编(2010)《全球华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主编(2016)《全球华语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2017) 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
- 陆俭明(2005) 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2017) 华语的标准：弹性和宽容，《语言战略研究》。
- 王海棻(2012)《古代汉语简明读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力(1962)《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1982)《龙虫并雕斋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2000)《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
- 杨伯峻(1980)《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 杨伯峻(1995)《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 杨伯峻(2005)《孟子译注》，100，北京：中华书局。
- 杨伯峻(2008) 我和《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守正出新》，北京：中华书局。
- 杨金鼎(1993)《古文观止全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叶嘉莹(2013)《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特质与吟诵》，台北：大块文化出版社。
- 张世禄(2000)《古代汉语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周清海(2003)《华语教学语法》，新加坡：玲子传媒。
- 周清海(2007) 论全球化环境下华语的规范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
- 周清海(2012) 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联合早报》。
- 周清海(2014) 华语教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
- 周清海(2015) 汉语融合时代的语言研究与语料库，《中国语言学报》。
- 周清海(2017) “大华语”与华文教学，《国际中文教育学报》，(1)，香港教育大学。
- 周清海(2018) 全球化环境下的古汉语教学问题——古汉语教学的改革思考，《文言文教与学论坛场刊》，香港教育大学。
- 周清海(2018) 新加坡的华语与华人，商务印书馆名家大讲堂第四讲，国家语委国际高端专家交流项目。
- 周清海(2018) 从现代汉语的特质和语言教学的需要看汉语的词类研究，《国际中文教育学报》，(3)，香港教育大学。
- 朱庆之、王婵娟等(2019)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古代汉语科目教学内容研究，《中国语文教学新探》，香港教育大学。

On the Issue of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A Personal View

CHEW, Cheng Hai

Abstract

My views on the issue of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are based on three premises: (1)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evolves from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yet this fact has not been given its due attention in research studies, (2)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since its opening and reform has triggere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3) With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eager to learn Chinese. Given these premises, it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ow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should be adjusted.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integration, teaching of Chinese